

煉石補天之時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
徑十二丈。方徑二十四丈。頑石三萬
五百零一塊。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
塊。只單剩下一塊未用。便棄在
青埂峰下。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。
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。獨自己無

列藏本石頭記管窺

胡文彬 著

此開卷第一回也。作者
番夢幻之後。故將真事

列藏本石頭記管窺

周汝昌署端

胡文彬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列藏本石頭記管窺

胡文彬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上海發行所發行 祝橋新华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5.125 插頁 42 字數 100,000

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000

統一書號：10186·708 定價：2.90 元

序

周汝昌

胡文彬同志新近撰成《列藏本石頭記管窺》一部書稿，特來問序于余。數紙捉筆，不禁思緒叢雜。爲什麼呢？「說來話長」，——這似乎是一句套語了，但是凡事一涉《紅樓夢》，那確實并非一言可了。在我頭腦裏，紅學的內容、內情、歷程、曲折……無往而不是複雜而微妙的一種「境界」。本書是一本研究《石頭記》舊鈔本的著述，好像這只是少數人的「版本」「校勘」的事情，與衆無關，可是單只這一「行業」的來龍去脈，說起來也就話長，而且一說起，我的感想也觸緒紛來了。

由于歷史的原因，中華古籍，在本土失落已久的，却往往在他邦異域有之。說什麼「禮失而求諸野」，豈不令人好生慚愧！遠的不必說了，近鄰東瀛，最富中國圖籍，通俗文學的書更是他們銳意蒐集的目標，可那裏就沒有一部《石頭記》的舊鈔本；他們的紅學家得到了一部程印本《紅樓夢》，已經視爲異寶了。這可見舊鈔《石頭記》是多麼難逢，是何等名貴。誰也沒有想到，在蘇聯的

列寧格勒，却發現了一部。事情往往不可以常理而推，有如是者。

這件事的根源，如果像《永樂大典》那樣，是清末「列強」的「聯軍」們焚掠北京時而流往國外的，那就絲毫沒有什麼可異之足云了，然而專家們說：它是道光年間由俄國教士攜往彼國的。這就真是奇上加奇，大出想象之外。

在清朝的時候，中俄兩方在文化上發生了交流的關係，並不是很晚的事情，比如曹雪芹在他的妙文中就提到了俄羅斯的雀金泥（今作呢）。我讀雪芹同時代人的文集，裏面就有提及俄國頭一個派遣留學人員到北京學習中國文化的記載，那是很被當作一件事來講的。但是我想那時候未必有人注意到戲本、小說這類不爲人重的「閑書」。然而有一位同志對我說過：有人聽他一位文藝界前輩說：老托爾斯泰寫《復活》等大部頭小說時受過曹雪芹的某種影響。這話不知是否「查有實據」，但也足以使人發生「遐想」，覺得這倒是滿有意味的一則「世界文壇佳話」。——等到我聽說真有《石頭記》早曾傳入俄國，自然歎爲奇絕。清初以來，歐西各國教士來華者也「更僕難數」，哪個國家又有人把《石頭記》鈔本帶去呢？

現時舉世皆已知有此本的存在了，并且也有海峽彼岸的學者親往蘇聯訪問，作了概況介紹，引起海內外學術文藝界人士的極大興趣。一九八〇年在威斯康辛大學召開的首屆國際《紅樓夢》研討會議上，潘重規先生的論文主題就是這部「列藏本」，那是對他以前介紹和研究此本的報道與

見解加訂補修正的文章。但在大陸方面，一直沒有多少關於此一課題的論著，這實在是對某些評論者所謂的紅學研究得不但「差不多了」而且「太多了」這類錯覺的一個諷刺。紅學領域中的荒原叢莽，異境神居，還那麼豐富廣闊，自己不去也不倡導人去開發探採，却站在前人走熟了的小徑上超然物外地嘲笑那些斬棘披荆、開山伐道的創路人，這已經是近年來紅學界的一種怪現狀（有的報刊，大約是因為戴着曲光眼鏡，或者由于對世界學術狀況的無知，專門喜歡發表這類妙文，當然也是為這種怪現狀起了推波助瀾的先鋒作用）。胡文彬同志似乎頭腦有異于此，他清醒地把客觀情況觀察估量得遠比那些評論者接近實際，所以他不但不是腳踏實地地向前走，而且曉得紅學上的真正的成績和空白。他走了些冷僻的新路徑。這些新路徑所通往的，倒也不一定就是什麼洞天福地、絕景奇觀，却可能是探勘新礦藏、新能源的有待開發之地。我以為他的這本書，就是這樣的一個好例證。

「認識事物要有一個過程」——這是大家常說的話了，但是我們的認識也并不就等于我們的實際。既然認識需要過程，自然愈是豐富複雜、愈是深刻偉大的事物，認識起來愈需要過程；但像曹雪芹的《石頭記》，就有些人把對它的認識看得那麼簡單輕易，講起話來就像他本人不需要認識過程似的，把他個人當前的一點「認識」當作最高最終真理的砝碼，拿來到處去挑剔，去「訓教」。比方，他會以一個「官員」的神態口吻，來批評說紅學界出了什麼「問題」了，他會指責人：你們為什

麼各種「外圈子」的事都去研究，單單只不研究「紅樓夢作品本身」！如此等等。我每遇這種高文，倒不禁請教之忱油然而生：同志，你說的那「作品本身」，究不知何指？是指百二十回程印本嗎？還是指的有別於那個托名續補、冒稱「全本」的雪芹原著呢？這兩個「本身」的關係和異同都是怎樣的？有多大的差別區分？這差別區分是文字的，還是思想內涵的？……這一大串的問題，你在詰問批斥別人時自己清楚不清楚？如連這些還并不清楚，說明你的「認識」還很需要「過程」呢，又有什麼資格來教訓別人？如果已然清楚，那事情就更奇了。我先想問你是如何清楚的？難道不正是由于有那麼極少數的幾個傻瓜在那裏辛苦萬狀地作出了「版本考證」的結果嗎？對原著、篡改、偽續、冒稱，這麼重大的問題進行了艱難困苦的工作，這倒不是「作品本身」的研究？那麼所謂「本身」究竟是個什麼概念和內容呢？假如你說的「研究作品本身」只是指從文藝角度去作思想分析、藝術分析的話，那就更加令人詫異了：你的科學的思想分析和藝術分析和據此而來的評論意見，又是根據什麼樣子的文字版本而立論的呢？涉及這個根本問題，難道不是仍然需要回到那些「不研究作品本身」的「考證派」們身上去嗎？我所以說：常識并不就等於實際。這樣常識性的簡單的邏輯，在我們這一行裏還在扯個不清呢，——還要大言什麼更高明的研究「方法」和「境界」，豈不實在令人吃驚？！

文彬同志在紅學方面做了不少工作；他是不是一個「考證派」？他自己喜不喜歡這個「稱

號」？似乎都可以「進行研究」，再作定論。在我個人看來，他的這本著作却是一本「版本考證」書，這誠然是「有什麼法子呢」！

提起版本考證，好像這只該是圖書館「善本室」、有辦法的大藏書家們的事，和一般人關係不大。未料想一部通俗小說《紅樓夢》，也鬧起什麼「版本學」來，確也讓人迷惑不解。近來有些文章，把《紅樓夢》版本研究的事溯源歸功于胡適。這當然也不是無稽之談，但是說得還不够精確。在他以前，早就有人將舊鈔本與坊間程本作校勘比照，而且有人曾要將他所得殘鈔本付之刊布，拙著中有所引及。但若只論「五四」時期以來的事，那麼雖然是胡適首先向世人介紹了「甲戌本」和「庚辰本」，可是有兩點必須說明：第一是他僅僅是利用舊鈔本中的「新資料」來證成他的觀點，他對這兩個極其重要的古鈔本，却并未也不想做出任何認真的研究；第二是他到底真重視舊鈔本（代表雪芹原著啊！），還是假重視？只舉一事就十二分清楚了：他不曾有過任何刊布舊鈔本的願望或計劃，却大張旗鼓地為刊印「程乙本」大賣力氣。

真正把識別、匯集、校勘衆舊鈔本，并寫定一部接近雪芹原著的好本子，當作紅學研究中的大主要課題和終生事業并為之多年慘澹經營的，是胡適以外另有人在。以我自己為例，從事這工作實始于一九四八年。開始時匯校的目標只有「三真本」（甲戌、庚辰、戚序）；此后舊鈔本陸續出現于人間，我們把匯校的目標擴大到九個甚至更多的本子。在這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中，才真

正認識了「石頭記」原著文字的百般異同變化的複雜情況和不同人手的妄加塗竄（不指偽續者程、高等人的偷改）的混亂程度。一字一句之差，真能分出文筆藝術的懸殊高下。我們愈加堅信：要談思想分析和藝術評論，必須先把原著的面貌弄個基本清楚才行，否則便是築室沙上。我們也愈加相信：這種工作才是真正的「作品本身」的「研究」的一個重要方式。在這種過程中，深深感到每逢多了一部新出現的鈔本的時候，它會對那些大量異文中的疑難問題是多麼寶貴的「表決助手」——也只有體會到了這些甘苦，才能知道爲什麼「列藏本」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義的。局外的議論，不管論調聽來多麼高明，多麼看不上「考證派」的所作所爲，我也還是不敢因此而輕看「版本考證」的勞動成果的，更何況像胡文彬同志的這一工作又是填補空白點的嶄新的貢獻呢。

所有關心「石頭記」原著本來面目何似的人，都應該感謝本書的著者。在我印象中，對「列藏本」的介紹研究，從一九六二年起，先是蘇聯方面的漢學家，然後是中國臺北的紅學家潘重規先生，然後有列寧格勒大學的龐英先生，而大陸上只有文彬同志一個。現在他這本書已經不是單篇論文而是專著規格了，而且也是海內外第一部專著，盡管內容仍受資料的局限，但它的里程碑性質是不可避免的。「樂爲之序」，自然是我的心情。

文彬同志在本書中所表現的學風十分純正。樸實無華四字看來容易，其實並不是人人可及的一種品德，在「紅界」中，不是爲真理研求而做老實學問的，譁衆以取寵的，貶人以抬己的，甚至

拿人家的東西當自己的，并非罕見之例，已經給紅學學術研究帶來了很壞的風氣。像本書這種氣派純樸，態度謙瑯，我看這不是「小節」。這是令人發生敬意的。

至于他的學術見解，我素來不主張以「我」量人，評長論短，那本身就違反了治學求益的基本精神。但此刻我還是想說一句，他的看法，有很多我都有贊同之感。例如他從多方面來推考這部鈔本的年代和它與其他鈔本的關係，就是明顯可見的好例子。如定要問我序者與著者之間所見有何差異，那其實也是二三見仁見智之點而已。比方認為曹頌會參加給雪芹鈔、批小說之事，我是想不太好的——不管他是雪芹的父親還是叔叔，在清朝乾隆時代這難以想象（古今中外，怕也找不出例證）。對「列藏本」上的眉批、側批如何看待，我暫持謹慎態度，它們是否盡屬脂批性質，還不敢斷言。第六十四、六十七兩回的著作權畢竟何屬？這個問題，大家正可繼續深入討究，文彬同志給我們提供了全文資料，將大大促進問題的解決，這是他的很大的貢獻。

有些「細節」，說來倒也不無趣味。我與家兄祐昌以及一二「紅友」，都注意細看各舊鈔本中的種種迹相，認為有的本子上的特殊的字迹情況引人注目，從其中可以窺見雪芹的某些原筆痕迹，并且推測雪芹的妻、兒、侍女有助他鈔寫的可能。如今看到文彬同志此書中，恰好也有類似的「假設」。此事饒有意味，因為是一種不謀而合，其中當有道理。自然，有人聽了，或許會議論我們如此提法不够謹嚴，出言無據。但是，一，謹嚴是治學的美德，然而也不能「謹嚴」得連一點推斷都不

許作出，那也過猶不及；二，所謂「有據」，那也須具體情況分別而論，若都有了曹雪芹和有關人的「簽名蓋章」才算「查有實據」，那豈但紅學根本不必存在而已。我們說「探索」，其中原來包涵容許着人們運用種種邏輯判斷的智力活動在內，而不是「核對賬目」。這事雖「小」，我倒是願意在此特爲一提的。

我每爲自己的書稿寫序跋時，常逢寒夜深宵；而每爲同行的著作寫序時，則又常逢「炎夏永晝」（借用雪芹之語）。不知這是何等「規律」？此刻酷暑異常，恰值又爲本書寫序。揮汗而爲文，雜事亦不肯相饒，在此情景下，談什麼「文思」、「文筆」，實在太覺粉飾其詞了。勉強塞責，倘以爲尙堪「覆瓿」，則幸莫大焉。

一九八四，八，六草訖

目 錄

序.....	周汝昌.....	一
--------	----------	---

引言.....		一
---------	--	---

一、列藏本流入俄國的始末.....		四
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-

二、列藏本的版本特徵.....		八
-----------------	--	---

三、列藏本正文與他本正文的比較.....		一三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--

四、列藏本第六十四回初探.....		三三
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--

附：列藏本第六十四回全文書影.....		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

五、列藏本第六十七回考略.....		四一
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--

附：列藏本第六十七回全文書影.....		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

六、列藏本正文的價值	四八
七、列藏本批語的概況及其類型	五〇
八、列藏本批語與他本批語的比較	六〇
九、列藏本批語的價值	七三
十、列藏本批語輯錄	七七
十一、列藏本在早期脂評鈔本中的地位	一五〇
附錄：關於列藏本的兩封來信（摘錄）	一三八
後記	一五三

引言

在《紅樓夢》版本史上，脂硯齋評抄本最爲珍貴。這主要是脂評本文較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，很少被改纂刪削。其次還因爲脂評抄本附有數量不同的評語，而這些評語又多出自雪芹身邊少數幾位至親好友之手，從中可以窺知一些寫書人的身世、寫書的意圖和創作的過程。

然而，從雪芹寫書至今，時過二百餘載，早期脂評抄本流傳至今者已是吉光片羽。一九二七年，胡適首先發現了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（世稱「甲戌本」），隨後，又相繼發現了脂硯齋四閱評本的「己卯冬月定本」（世稱「己卯本」）、「庚辰秋月定本」（世稱「庚辰本」），以及戚蓼生序的「有正本」、「戚寧本」、「戚滙本」。此外，還有「舒元煒序本」、「蒙古王府本」、「夢覺主人序本」（又稱「甲辰本」或「晉本」）、「鄭藏本」（存二回）、「夢稿本」（又稱「高閱本」或「楊藏本」）。「靖藏本」僅存一百五十條批語，其原本據說已迷失，至今尚未發現。

一九六二年，在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抄本室的藏品中，發現了一部曹雪芹

著《石頭記》抄本。一九六四年，蘇聯漢學家緬希科夫（Л. Л. Меньшиков）和里弗京（Б. Л. Рифкин）〔1〕在《亞非人民》雜誌第五期上，發表了一篇題為《新發現的石頭記抄本》的專文，首次報導了這部新發現的抄本《石頭記》（簡稱「列藏本」或「脂亞本」）的消息。作者在該文中不僅較為詳盡地介紹了列藏本的概貌，而且還提出了他們對這個早期抄本的初步研究的看法。

近年來，又有臺灣省的著名紅學家潘重規先生、旅法華僑陳慶浩先生、旅蘇華僑龐英先生，先後根據緬希科夫、里弗京的報導及自己所得的有關資料，撰文討論列藏本的抄寫年代、正文特點、批語價值，以及它在《紅樓夢》版本史上的地位。毫無疑問，已發表的列藏本研究文章，對於廣大紅學研究者進一步了解和研究這部早期抄本《石頭記》，提供了許多有益的資料和很好的啓發性的意見。

《石頭記》早期抄本，是研究《紅樓夢》一書思想、藝術的重要資料和版本研究的主要對象。因此，廣大紅學研究者對每一部早期脂評抄本的發現，都是予以極大關注的。這兩年，機緣湊泊，我

〔1〕緬希科夫：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高級研究員，漢學博士，研究敦煌抄本。紅學論文有《長篇小說紅樓夢的無名抄本》。

里弗京（又作李福親）：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，語言學博士。一九八〇年底莫斯科國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編譯的中國——六世紀（漢魏六朝）小說集《紫玉》。紅學論文有《長篇小說紅樓夢的無名抄本》。

有幸較多地獲得了一些有關列藏本的複印、照像和抄錄的資料、評論文章。經過較長時間的積累和研究之後，形成一些粗淺的想法，願在此提出來，求正于各位紅學版本研究專家。

一、列藏本流入俄國的始末

當我們要着手全面研究列藏本的時候，首先遇到一個問題，就是清乾隆年間傳抄的、爲數極少的《石頭記》脂評本，它是什麼時候、通過什麼樣的手段流入俄國的？根據我現在能够看到的有關資料證明，列藏本是清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，由一個在北京的俄國希臘正教會學習漢文的俄國學生帕維爾·庫連濟夫（П. Курляндев），將這部珍貴的抄本《石頭記》帶回俄國的。

俄國希臘正教，又稱東正教或正教。自一七二一年沙皇彼得一世宣布設立「正教最高宗務會議」，掌管全俄東正教事務後，東正教實際上已成爲沙俄國家機器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，「變成了國家的普通工具，變成了對內進行壓迫和對外進行掠奪的工具。」（二）一六八五年，在雅克薩戰爭中投誠的俄俘被遣送北京，並被編入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七佐領，駐北京城東直門內的

〔二〕馬克思：《希臘人暴動》，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，一九六二年版，第十卷，第一百四十二頁。